

藏书与扔书

肖复兴



少年时家穷，没有几本书。第一次见到那样多的书，而且是在有玻璃门的书柜里，是我到同一个同学家，他父亲是当时北京日报的总编辑周游。那时，真的很羡慕。渴望坐拥书城，是少年的梦想，也是那时的虚荣。

第一次买的像样点儿的书，一本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编选的《李白诗选》，一本是冯至编选的《杜甫诗选》，一本是游国恩编选的《陆游诗选》，一本是胡云翼编选的《宋词选》。定价分别是1元5分、7角5分、8角、1元3角。现在看价钱不贵，当时对于我已属奢侈，是偷得家里一张5元钱的票子买下的，为此屁股挨了一顿父亲的鞋底子。

那时，我读初二。那时，家里没有书架，更不用说书柜，是父亲和弟弟动手，用烧红的火筷子穿透两根竹竿，再搭上一块木板，权且当书架。只有一层，前后可以放两排书，书架下面，是我家的米缸。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都有了。

从北大荒插队回北京当老师，第一个月的工资，我买了一个书架，花了22元，那时我的工资是42元半。这是我的第一个书架。如果说我真有什么藏书的话，是后来花了20元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是旧书。之所以书架和这些书的价钱记得那样清楚，是因为它们都属于第一次。虽然屡次搬家丢弃了很多东西，它们却一直如影相随，还跟在我的身边。

我不是藏书家，对藏书没有任何奢望。我只是一个作者兼读者。买书，便成为生活中如买菜一样经常的事情。随着日子和年龄一起的积累，家里的书越发其多，不胜其累，清理旧书便迫在眉睫。我发现不少书其实的是没用，既没有收藏价值，也没有阅读价值，有些根本连翻都没翻过，只是平添了日子落上的灰尘。便想起曾经看过的田汉话剧《丽人行》，有这样的一个细节：丽人和一商人同居，开始时，家中的书架上，商人投其所好摆满的都是琳琅满目的书籍，但到了后来，书架上摆满的就都是丽人行形形色色的高跟鞋了。心里不禁嘲笑自己，和那丽人何其相似，不少书不过也是充当了摆设而已。藏书而不读，藏书便没有什么价值。于是，便开始了一次次处理掉那些无用的书或自己根本不看的书，然后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扔掉。

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藏书的过程，就是不断扔书的过程。藏书和扔书并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书买来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正经的读书人（刨去藏书家），应该是书越看越少，越看越薄才是。再多的书，能够让你想翻第二遍的，就如同能够让你想见第二遍的好女人一样的少。想明白了这一点，贴满两面墙的书柜里，填鸭一般塞满的那些书，有枣一棍子没枣一棒子买来的那些书，不是你的六宫粉黛，不是你的列阵将士，不是你的秘笈珍宝，是真真用不了那么多的。在扔书的过程中，我这样劝解自己：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你不是在丢弃多年的老友和发小儿，也不是抛下结发的老婆或新欢，你只是摒弃那些虚张声势的无用之别名，和以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虚妄和欲望，以及名利之间以文字涂饰的文绉绉的欲望。

对于我，这些年，扔掉的书，比现存的藏书，肯定要多。尽管这样，幸存的书依然占有我家整整10个书柜。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次彻底的清理，坚决扔掉那些可有可无的书。只有扔掉书之后，方才能够水落石出一般彰显出藏书的价值和意义。一次次淘汰之后，剩下的那些书，才可以称之为是藏书，它们与我不离不弃，显示了它们对于我的作用，是其他书无可取代的；我对它们形影不离，说明了我对它们的感情，是长期日子中相互依存和彼此镜鉴的结果。这样的书，便如同由日子磨出的足下老茧，不是装点面粉上的美人痣，为的不是好看，而是走路时有用。

我心中存留的藏书，大概有一个书目：《鲁迅全集》，包括后来买的《鲁迅书信集》，《孙犁文集》，《契诃夫文集》，《泰戈尔文集》，《史记》，《诗经》，《楚辞》，《唐诗选》，《宋诗选》。还有刚刚粉碎“四人帮”时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的诸如雨果的《九三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上下两卷的《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等一批外国文学名著。那是我文学的启蒙和写作的老师。此外，我会留下最近这些年新买的而且一直放在床头带在身边的钱钟联编注的陆游的《剑南诗稿》八卷，浦起龙编注的《读杜心解》两卷，以及当代为数不多的相识和不相识的中外作家学者的代表新著。我想，这些足够我晚年翻阅的了。

当然，《李白诗选》、《杜甫诗选》、《陆游诗选》、《宋词选》那4本书，会在我的保存书目之列，因为那是我的少年藏书，而且，跟着我从北京到北大荒，又从北大荒到北京，风雪中的颠簸，已经有50多年。它们已经很破旧了。如果说藏书，它们才真正是我的藏书，或者资格说是藏书。

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为何蹿红？

李朝全

历史纪实一枝独秀

心理需求密不可分。所有的历史都指向现实，所有的传记都指向个人和读者。

历史纪实具备实录、史志、史传以及史鉴价值，在阅读市场上颇受追捧。尤其是那些内容新颖独特的纪实，那些富于个性色彩、感人泪下、曝光私密的自传或名人传记，更是在市场上大出风头，吸引住众多读者的眼球。王树增的《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作品篇幅长达数十万乃至130万字，提供了丰富的新鲜史实内容，很好地满足了读者对于知识性、趣味性的需求。金一南重写中共早期历史的《苦难辉煌》大为畅销。李洁非的《胡风案中人与事》探析荒唐时代与小人命运命运的关联，启人深思，以区区一两万字的篇幅竟摘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张培忠的《文妖与先知》挖掘“性学博士”张竞生鲜为人知的生平，带给读者新鲜的阅读体验，被改编成电视剧《铁血兄弟》。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其间出现了一批与毛泽东有关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湖南女作家余艳在《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12期上发表了《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通过独家披露的杨开慧当年的日记手稿，考证她与毛泽东的爱情往事及其心路历程，内容真实可信，人物炽热的情感力透纸背，同时也很好地补白了当年的一段史实。这篇作品以其独特的题材受到了文坛内外广泛的好评。

新内容、新视角、新发现与新思考

历史纪实创作大多建立在新发现文史资料、档案、田野调查或口述实录搜集到的新材料等基础之上，大多带有揭示历史真相、内幕或隐情乃至“抢救历史”、“重述历史”的意味。因此，不少的此类作品实质上是一种旧闻新知，具有较强的信息性、新闻性，能够满足读者探见历史真实的阅读期待。

在历史题材创作上，作家们特别重视新视角和新思考，赋予自己的作品以鲜明的历史理性色彩。小说作家薛媛媛写下的长篇纪实《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一书，深入挖掘那段不该被忘却的历史，实际上是对共和国橡胶开发史和经济发展史的一段补白。张雅文的《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生动地回顾了香港被英国侵占直至顺利回归155年的历史，以历史的关节点为线索，连接起香港回归前后的变化，对香港社会存在的五光十色的社会问题客观地进行了反映和思考。

徐怀中的《底色》以作者当年的亲历日记来还原一位战地记者眼中的历史，在战争和人的关系中张扬人性的光辉，题材独特，广受关注。

除了革命历史题材之外，其他历史题材也备受关注。小说家阿来的非虚构纪实《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试图通过对甘孜州一个叫瞻对的小村落居民生存状态的描写，通过藏民与政府当局关系的变化过程的描述，反映康巴地区传奇般的历史，令人耳目一新，受到了读者瞩目。

历史纪实指向当下生活

历史是现实的镜鉴，历史纪实往往都指向当下社会生活，对今天的读者和人们富于启示意义。《忠诚与背叛》作者通过深入挖掘红岩历史往事，揭示出“忠诚与背叛”是一个革命者最根本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对信仰的坚守与否同个人职位高低无关，同性别无关。根据作者的考察，在红岩历史中，地位越高的官员背叛信仰、沦为叛徒的几率反而越高，而女性则几乎没有叛变的。通过揭开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作者生动地阐述了理想与信仰的问题。理想与信仰至今依旧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根本性问题，树立远大理想是解决当下不少人思想迷惘、价值空虚的一味良药佳方。

历史纪实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可以帮助读者增进对历史本真的认识与了解。王树增的《长征》，吴东峰、朱继红的《长征：细节决定成败》，或者为读者提供新颖丰富的史料，或者提供新鲜的视角，都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

历史题材中的人物传记、回忆录等对读者则往往具有励志、激励作用。许多人物的生平经历，他们的思想魅力、精神魅力都能带给读者潜移默化的浸染与熏陶。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通过记述领袖伟人的一生，带给读者深刻的艺术感染和思想教化。张雅文个人传记《生命的呐喊》以一个小人物的不凡人生，特别是其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抗争的过程，带给读者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洗礼。这些作品均曾不断再版或重印。

历史纪实的畅销与热销，可以带给文学创作者多有益的启发。



文学新观察

近年来，报告文学作品的市场销量和读者数量明显下降，然而，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却一枝独秀，这边风景独好，读者拥趸激增，不断创新阅读、销售新纪录。人民文学出版社近年来陆续推出的王树增非虚构系列，包括“非虚构战争文学系列”的《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上下卷），以及“非虚构中国近代史系列”的《1901》和《1911》，其图书总销量已超过150万册，成为该社仅次于引进版《哈利·波特》系列的巨型畅销书。其中，长篇纪实《长征》已印刷25次，销量40多万册；《朝鲜战争》销量20多万册；《解放战争》已经15次印刷，销量80多万册。王树增系列作品为出版社创造的纯利润超过了2000万元。目前，王树增正在创作“战争文学系列”之长篇纪实《抗日战争》。而华艺出版社出版的金一南的历史纪实《苦难辉煌》销售了100多万册，创造了主旋律作品热销的新纪录。此外，何建明（执笔）、厉华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销量也达到了几十万册。岳南著《南渡北归》系列自2011年首版至今，已经印刷了11次，不久前又推出了三卷六册的大字版本，总发行数20余万套。

由此可见，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相当热销，深受读者欢迎。需求影响生产。这种强烈的阅读需求也带来了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领域史传著作风行。一方面，读者对阅读历史著作、人物传记确实怀有较大兴趣；另一方面，史传著作通常具有多方面的较高价值，特别是那些披露历史细节情节、揭示鲜为人知的史实、有着独到思考发现的作品，更是具备独特的思想价值、史志价值和社会价值等。因此，一段时间以来，“长篇历史纪实热销”、“名人伟人传记热”等大行其道，风靡一时，既受读者欢迎，亦受出版商热捧，出现了历史题材占据报告文学市场的现象。

历史纪实具有独特价值

历史题材作品在报告文学中占有很大比例，也是最易受读者欢迎和拥趸的一种图书样式。在当前图书市场，历史纪实和人物传记依旧保持着较好的市场反应，这与普通读者渴望了解历史、探秘往事、以史为鉴的阅读

故乡紧挨着太行山，多的是山岗丘陵。故乡人爱吃大锅菜，大锅菜里面有白菜、豆腐、粉条、海带等，肉时有时没有，全看经济条件和吃荤还是吃素。大锅菜里的材料，海带这里没有，其它的都有。有了豆腐粉条，切一棵白菜或剁半块瓜，放肉或不放肉，也不管手巧还是手笨，只要大火炖一阵子就成了大锅菜。

大锅菜里，粉条是少不了的串客了。种红薯多的年代，过年前每个村里都有人做。做粉条不是很复杂的，磨灰、打糊、漏条、热煮、晾晒干了就成了。过去，我家里就曾经用烙饼床子压过粉条。不少人家做的纯红薯粉条，就个纯淀粉，并不在技术上太拿捏。

满地遍野种红薯的年代，早已随风远去，好多人吃红薯成了新鲜，做粉条也不那样普遍了。但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吃大锅菜的风俗和嗜好没有变，舌尖上的味蕾对粉条的记忆和恋情依然。于是，市面上，有人做粉条，往炭里面掺别的面，吃起来没劲，腻叨叨的不打牙口；更气恨的，光图好看，净往里面掺胶，煮不烂也咬不动。人们打心眼里面喜欢的，仍然是贫穷年代吃到的纯粹的红薯粉条的味道。

这些年，平原上沿着古河道的村，沙土地多，种红薯耐长。丘陵地儿，有专门种红薯、做粉条的。他们愿意留住祖传的手艺，留住陈年的口味儿。

太行山脚下有个功德汪村，做手工粉条还做手工挂面，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到现在还做。癸巳年寒冬的一个艳阳日，我和一个文友慕名来到功德汪，看这里的人做粉条。

从村北岭坡上下到村里，不远，就看到一缕青烟从街旁边冒起来。走近了，就看见南墙根有几个

人正在做粉条。用石块垒的大灶台，外面用新泥抹了一下。上面安了口头号大锅，加满了水，一个老婆婆在加柴。灶台右边是一张方桌，放了大瓷盆，一个老汉和一个中年人，挽着胳膊，一手按着盆沿，一手握着拳，和一大块炭团子。灶台东边，一个年轻人手里夹着筷子样的两个细木棍，等着挑粉条，身后有一个凉水缸、一个木架子。

说话的工夫，面团和得溜了，抓一把一用力，唧唧的小鲢鱼似的，从指缝里钻出来。长者便伸手拽一团，放到一个安全帽做成的漏瓢里，端到锅上面，另一只手握成拳，轻轻地敲击着漏瓢的手腕。安全帽底下钻了一圈圈孔眼，孔的大小和形状决定着粉条的粗细和圆扁，全凭人的喜好。敲着敲着，一缕白色的芡条儿就垂流下来了，进到微微沸起的开水锅中。东边那人就用大筷子像钓鱼般，轻轻转着圈。一会儿的工夫，芡条在锅里的颜色由白变得土黄，再煮得熟透，就成了晶莹的粉条。挑出来，先在大缸里冷却一下，然后挑起来挂到架子上晾着，那边又是一瓢下锅了。

这时，过来一位凑热闹的，人叫他张老师。他告诉我，眼前你看到的，就像唱戏一样，只是其中压轴的一出。能做出好的粉条，得从红薯开始。挑出没有黑斑的红薯打芡，打出来用细纱布过滤三四遍，使芡粉细腻纯净。

我还知道了粉条出锅后，不能直接晾干完事，而要经过水冻和解冻再晾干，才最后完成。村里一个主任领我去看。进到院子里，撩开东屋棉帘，就看见地上摆着一挂挂水坨子。他说，粉条包在水凌里面，都是在头天夜里冻的。到了晚上，他提了喷壶，往冰坨上洒水，让冰坨更结实。第二天晴好了，一棒一棒地捶，随着噼水在棒下一块块碎裂，粉条像美人出浴般展现出一身的纤巧亮丽。挂到房顶上面，再沐几缕艳阳，很快便迎着清风，轻歌曼舞开了。

张老师说，粉条越纯，粉条越筋道透亮。粉条的确比人脆弱得多，但它们却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粉条对雾霾绝对拒绝。无论是冰冻前还是解冻后的晾晒过程中，只要遇到雾霾的侵袭，粉条就会用断裂成碎段来抗争。好在，大山脚下的丘陵和沟坡里，远离雾霾。

手工做法，使得面食和人有更多情感的交流，正因为此，才使得其比生硬冷漠的机械产物有了更多的温情。手工粉条和当下的许多手工面品一样，即使在当下已经不是一个多么赚钱的营生，人们也仍愿意作为念祖的方式自我享用，在传承中自得其乐，期望长远。

家乡的手工粉条

董竹林



向阳莲花 刘鹏摄

小说《世纪病人》表现新移民精神困境

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李晓桦长篇小说《世纪病人》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小说融合了军人世家、新锐诗人、新移民和思想者的多重眼光，揭示了一位老兵因不能承受断根之痛，在异国他乡深陷精神困境，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世纪病人”的心路历程。作者以诗人的敏感和锐利剖析自己的精神世界，深度思考了自由、孤独以及“我究竟是谁”等哲学命题，并由此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加速度变迁和历史的诡谲以及西方社会的真切样貌。小说的语言简洁犀利，充满黑色幽默意味，叙事手法新奇诡异，读来酣畅淋漓。

神州